



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的讲话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2015年3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讲话

要切实推进关键项目落地,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经贸产业合作区为抓手,实施好一批示范性项目,多搞一点早期收获,让有关国家不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016年8月,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挥国家高端智库青年专家积极作用——“中央党校青年学者30人论坛”成立

近日,“中央党校青年学者30人论坛”在国家高端智库中央党校成立,并召开第一次研讨会。

据介绍,“中央党校青年学者30人论坛”是中央党校《助推青年学者成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中央党校青年学者的成长成才搭好平台、创造条件。

中央党校副校长黄浩涛表示,中央党校面临许多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为青年学者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央党校青年学者30人论坛”是为青年学者专门搭建的一个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平台,有利于活跃学术空气,调动青年学者的科研积极性。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韩庆祥也表示,通过“中央党校青年学者30人论坛”,能加强对青年学者的引领和带动,凝聚一大批青年学者,充分发挥中央党校国家高端智库青年专家在理论建设、思想引领和建言献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论坛第一次研讨会以“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主题。与会的青年学者来自不同研究领域,他们从不同角度,深入解读阐释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林振义等也出席了研讨会。

(文/杨谢)

有效提升“一带一路”基建投融资效率

张丽平

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发展所需硬件条件的重大使命。设施联通的关键点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据本研究估算,2016年至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合意投资需求将超过10.6万亿美元。

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多种、方式多样

对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可以利用的资金主要包括沿线国家内部的金融资源、沿线国家之间的金融资源互通以及国际金融资源。

就融资模式而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与单一经济体内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没有本质性的差别,信贷、债券、股权、公共资金支持是其中最基本的方式。同时,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衍生工具,包括夹层融资、混合融资、PPP、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与之有关的融资工具等等。

在基本方式中,信贷是基础设施项目的传统融资工具,包括商业贷款、开放性贷款、政策性优惠贷款。对于具有跨区域性质的项目,由多家贷款机构组成的银团贷款是最常见的方式。发行债券也是规模较大、期限较长的基础设施项目通常采用的融资方式。与贷款相比,债券融资的优势在于融资期限较长(有时融资期限可长达几十年),利率水平较低。股权融资也被定义为资本金,很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由于资本金投入巨大,通常需要多个投资者担当出资人角色。这些投资者或以现金,或以土地和设备等资产进行出资。

缺乏优质项目是影响投融资进程“主因”

对于基础设施投融资而言,首先要有可投的项目,然后才有融资及后续业务的开展。资金的逐利本质决定了投资者会青睐那些有良好发展预期的优质项目。现实中,“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优质项目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经济体和少数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有条件获得市场资金的青睐,融资环境相对宽松,而那些亟须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挖掘发展潜力的国家和地区则优质项目缺乏,受资金短缺的束缚较为严重。从调研的情况来看,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建设施潜在投资项目众多,但缺乏优质项目是无法回避的难题,其主要原因在于:

沿线国家的发展环境差异较大。“一带一路”涉及65个国家和埃及的西奈半岛,各国在政治制度、经济社会体制和发展程度、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由于透明度不足及语言多元等原因,外部资本在进入各国国内基础设施领域时往往心存疑虑,要花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去了解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即便做了充分准备,在进入后也难以避免水土不服的问题。而且由于多方面的差异,国家之间协调的难度很大(个别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历时20多年仍没有得到有效协调),

难以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为外部资本的投资行为提供有效保障。在基础设施领域,这些问题与基础设施项目固有的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等问题叠加,进一步加大了吸引市场资金进入的难度。这些问题在经济不发达、政治不稳定、法制不健全的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缺乏可靠稳定的盈利模式。基础设施投资的盈利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使用者付费,二是在因基础设施改善提高的财政收入中安排资金进行支付,三是因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周边区域商业升值。第三种来源是中国发展基础设施的重要经验。这三种盈利模式都存在一定风险。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方、运营方而言,使用者付费模式存在市场发展低于预期的经营风险。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发展低于预期的可能性较大。财政资金支付模式则受制于东道国的整体财政能力。“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均存在严重的财政赤字,债务违约风险较高。周边区域商业升值模式的风险在于东道国的土地制度,对于土地私有的国家,周边土地并不一定能提供给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方开发,第三方开发的收益也不一定会上建设运营方分享。现实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债务违约率较高,有的国际咨询机构甚至将有些国家列入高风险债务人。

地缘政治风险需防范。“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和地区具有独特的资源能源和区位优势,处于大国利益角逐的中心地带,政治经济形势十分复杂,国际形势特别是域外大国势必影响这些国家的政策。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改善基础设施、实现更好发展方面拥有共同的愿望,但并不排除其与其他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难以割舍的利益诉求(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从而给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不确定性,增加投资风险。

为解决上述问题,将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变为真实的投资行为,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各类主体既要通过分析挖掘具有发展潜力的优质项目,更要在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域内基础设施项目对市场资金吸引力方面共同努力,形成“投资环境改善→优质项目增多→融资渠道拓宽→经济快速发展→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的良性循环。

四方面对策有效提升投融资效率

为了提升域内基础设施投融资效率,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可考虑重点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坚持共建原则,以东道国为主。“一带一路”是众多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的“一带一路”。完善域内基础设施,促进设施联通,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但应以东道国为主。历史经验表明,一国基础设施的改善仍需主要依赖其国内自身力量,外部力量只能作为有益补充,不能也无法成为主导。就金融资源而言,除个别存在地区冲突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拥有自己的储蓄、信贷,也有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市场。这些金融资源是各国发展国内基础设施的基础性资金来源。

第二,加强合作,改善域内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挖掘与打造域内基础设施投资的优质项目,是提升域内资金互联互通及对域外资金吸引力的关键,为此应加强合作,大力改善域内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合作的重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加强沿线国家多边、双边沟通与协商,构建致力于改善整个区域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的合作和对话机制。二是在资金与基础设施项目之间搭建起信息互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平台,在条件允许的领域率先形成制度化合作机制。三是在域内基础设施投资风险的识别、防范与应对方面加强合作。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任何风吹草动,如政府换届、汇率大升大降、他国干预、民众抗议、宗教运动等,都会造成项目的停滞甚至终止,风险的暴露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国家利益遭受严重损失。对此,沿线国家应就风险考察指标设计、风险因素跟踪、重大风险防范与应对等展开积极合作。四是加快推进投融资条件较好的项目建设,将其打造成为早期收获项目,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域内外投资者对“一带一路”项目的信心。

第三,坚持市场化运作,加强域内外金融资源的统筹和各种融资渠道的使用。“一带一路”倡议虽然由政府主导提出,但在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推进方面应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使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企业成为投融资主体。政府的责任是通过合作搭建多边或双边的保障机制,为企业的行为提供良好环境和有力支持。为提高“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效率,首先要加强对包括各国内部金融资源、沿线国家之间的金融资源互通以及域外第三方资源在内的商业性、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资源的统筹。鉴于“一带一路”地域广、域外影响因素多等特点,在统筹金融资源时必须将域外第三方资源考虑在内,尤其是拥有丰富金融资源的发达经济体,以便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超越区域边界的利益共享平台。其次要根据项目的条件,灵活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包括信贷、债券、股权、公共资金、夹层融资、混合融资、资产证券化、设备租赁等。

第四,在充分尊重东道国国情的前提下,发挥中国的积极作用。作为首倡者,中国将以其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经验、资金和技术,成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成功经验的积极分享者、项目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合作机制的共同推进者。在“一带一路”基建建设方面,沿线国家希望与中国分享发展经验,更重要的是希望从中国获得建设资金和技术。在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在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方面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实现了资本积累,在很多基础设施领域都处于技术全球领先地位,如路桥、高铁、电力生产等等。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正是希望与沿线国家分享这些成果。介绍中国的有益经验,需要先了解对方的实际情况,对照两国的差异,找出中国经验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点,促使其进行相应的调整。同时在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时量力而为,因为中国只有自身保持稳定发展,才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持续贡献力量。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及对策

范艳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政府的支持,使中国企业已经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技术和条件。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现状

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1月至10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2个国家和地区的702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9619.3亿元。同时,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呈多元化发展。从早期的倚重寻求自然资源转向全球战略布局,从传统的资源、能源行业和制造业,逐步拓展到地产、金融、农业等多个领域,呈现出更为优化的多元产业格局,并且以前期的设备供应、工程承包向PPP投资模式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建设成海外投资热点。2016年1月至10月,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的51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20.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8.3%。对外承包工程方面,2016年1月至10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6877份,新签合同额843.9亿美元,同比增长30.7%;完成营业额527.4亿美元,同比增长5.6%。

海外投资风险重重

海外项目投资面临的风险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且易受各种因素波动的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风险重重。

一是自然灾害风险。自然灾害风险是因自然力的不规则变化产生的现象所导致危害经济活动、物质生产和生命安全的风险,对企业实现海外投资项目的经营和战略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二是经营管理风险。经营管理风险是指生产经营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包括经营决策、融资、人力资源等日常经营过程中的内部管理导致的风险,这一风险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的效果。由于企业在相关领域不同的国家投资经验不足,仍然使用国内投资项目的经验和方式,往往会造成决策错误,从而引起更大的损失。

三是东道国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因东道国政府行为、政治事件甚至发生战争、暴乱等政治性事件引起的海外投资东道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海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政治风险是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最难以把握的风险。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的地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和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这意味着我国海外投资企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不容忽视。

四是东道国政策与汇率风险。一些企业往往只看到了东道国的优惠政策,但对东道国的法律政策和监管环境不够了解,对东道国相关部门在政策和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尺度把握并不清楚,这很容易给投资者造成经营和财产上的损失。许多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与国内相差较大,企业在海外投资时经验不足,很容易遭遇东道国土地使用成本提高、经营利润的流动限制、税率提高和汇率不稳定等风险。

规避投资风险的对策

一是加强风险意识。有效识别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从国际环境、东道国内部经济政治自然环境等,了解整个投资环境的变化条件和表现,把握风险形态。中国企业应该在投资前对项目风险进行科学评价,做出正确判断,以寻求合理的风险分担结构。例如,在进入一个国家市场前,可以通过聘请国际和目标市场专业咨询顾问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咨询公司等,对目标市场的产业政策、市场容量、财政政策进行专业分析。

二是进行风险评估。利用已有的数据资料和相关专业方法分析各种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在进行投资前对整个项目做可行性分析,对影响项目进展的各个因素逐一深入分析,预测出可能存在的风险,充分沟通,合理分担。中国企业在选择对外投资地点时,须考虑自然条件的历史和现状,规避可能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对于政局不稳定的国家,尽可能选择已经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条约的国家。在“走出去”之前需要广泛咨询各级政府、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内外金融机构对目标市场风险的接受程度,是否符合国家“走出去”相关支持政策、政治以及经济风险是否可覆盖、是否可以获得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融资支持等。对于合作伙伴的选择,同样需要进行市场和财务方面的分析,选择有实力的合作伙伴。

三是建立风险管理及应对队伍。企业管理者应充分重视企业的管理制度和组织形式的合理性。企业应该建立一支高水平、多专业的项目团队,从各个方面来预防项目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严格控制项目成本,把质量和安全问题。建立风险管理及应对队伍,及时针对投资风险采取相应管控措施,形成风险管理计划。比如,在中兴能源“一带一路”的成功案例中,就设计了一个全方位的“保险包”,包括了运输保险、建安险、财产险、海外投资险(承保战争及政治暴乱、汇兑限制、征收等风险)、运营能效保险(承保运营风险)等。

(作者系中兴能源有限公司副总裁)



小议智库选题的模式与特点

李宁

着这种智库成果是没有用处的,相反,它是积累智力研究资本、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的起点,不仅有助于丰富智库研究成果,而且有助于从宏观上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

还要看到,基础研究型选题的研究通常具有超前性,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战略决策都具有引领作用。虽然暂时可能看不出其对国家发展建设有什么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展现出该智库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由此产生的社会价值,并能够被有效利用,乃至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有效政策。

对策应用型选题是指为获得新成果而进行的创造性的研究,它主要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标。在围绕特定目的或目标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获取新的成果,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一般只影响到比较有限的范围,并针对具体的领域、问题或情况。

此类选题通常是根据国家当前政策以及某一领域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一时期内、某一领域内的决策建议。由于该选题具有时效性,因此,对研究者的科研水平要求较高,需要研究者站在问题的前沿,寻找问题研

究的理论支撑,保证研究工作在理论的指导下有序进行。这就要求研究者要拥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能够获得相关准确数据,从而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如果以上主客观因素不具备,就会形成久攻不克,甚至中途撤项的情形,影响选题最终完成。

需要注意的是,在对策应用型选题的研究中,一定要有科学的预见性,这是研究这类课题必备的一项技能。科学的预见性是建立在实际应用之前的猜想,这种猜想是对未来的观察和把握,是具有科学性的猜想,而不是臆测的“乱想”。一个好的预见是此类课题研究的关键,研究者的大胆预见往往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素养基础上的,对时局、形势的判断带有科学性,是非常有价值的,乃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决策层的对策。

可见,智库选题需要根据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经验基础、兴趣爱好、学术环境来确定,切不可盲目贪大求多,选择一些不符合自身特点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样既不利于出成果,也有可能对决策层的应对时限产生不利影响。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